



师

陀

论

王  
欣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师

陀

论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师陀论 / 王欣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305-09436-1

I. ①师… II. ①王… III. ①师陀(1910~1988)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609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师陀论  
著 者 王 欣  
责任编辑 黄隽翀 编辑热线 025-83685720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8.125 字数 252千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09436-1  
定 价 27.00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mailto: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mailto:Sales@NjupCo.com) (市场部)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序

作家研究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因为是作家们坚实的存在才构成了文学史璀璨的星空。然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研究者们曾经非常专注且取得了丰硕成果的作家研究在新世纪以来却突然放缓了脚步,显得比较冷寂。特别是对一个作家系统、全面、立体的发掘与研究已经不多见,只有对单篇作品的解读依然热闹,而这却难以支撑起对作家作品全面、深度的观照,难以带来在作家整体研究中才可能实现的力度与阔深度。在这片萧瑟的景观中,王欣的《师陀论》无疑是新世纪以来作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收获。

师陀是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作家。在传统的史学观及文学史叙事中,由于师陀不属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主流作家,再加上作家本人为文做事谨慎低调,虽然其作品题材体裁广阔、丰富,但因其创作的复杂、芜杂及卓然独步,学术界往往难以对其作出简单的定论,相对于中国现代其他作家的研究,师陀研究一度显得非常沉寂。然而,真正优秀的作家在时间的淘洗中,终会冲破历史的障壁,绽放出动人的光华。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著名学者刘增杰对于师陀史料的整理,钱理群、杨义等对师陀经典作品文本细读的带动下,师陀研究逐渐升温,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师陀研究的动向并投入其中,出现了一批富有学术含量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大多是对师陀

创作的局部或单方面观照，而对其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非常鲜见。本书的作者王欣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师从于刘增杰先生，受先生师陀史料研究的惠泽，开始涉足于师陀研究领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作者展开了对师陀其人其作的全面研究，并将之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师陀论》就是作者对博士论文的进一步修改、完善和升华的出色成果。

《师陀论》是对师陀系统、全面、立体的探索与研究，该著问题意识强烈，观点富有创意，是一部颇有理论深度的作家论。首先，该著的特点体现在它不是一部平面化的作家论，没有掺杂所谓作家研究中惯常的“水分”，而是极力走进作家丰富的内心世界与文本世界，与作家进行心灵的真诚对话。作者对师陀研究领域关注已久，在把握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带着诸多问题，针对师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着力于从作家的“文化气质和心理”、“创作主体的个性言说”、“女性意识”、“理想生态家园的文化想象与建构”、“佛教浸润与超越情怀”等颇能切近师陀创作“原相”与丰富内涵的层面深入开掘，颇有深度地解读和阐释了研究对象的生命体验、文化心理结构以及个人书写的独特性。著作视野开阔，论析全面。作者将对师陀文学创作活动的整体性考察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阔深背景中，以多元的价值体系为参照，展开师陀与相关文学个体和流派的比较、影响研究，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的语境中，全面、系统地探讨其独特性和文学史地位。特别是论者将师陀与鲁迅、老舍、沈从文、萧红、巴金等相关个案作为参照和比较，从“对时代精神的呼应与深度表现”、“对人的全面谛视”等层面动态而立体地展开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师陀以作品艺

术地切入时代而表现出的卓尔不群，使得师陀的丰富性与“个人性”特征凸现出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那种对作品的审美感悟与敏锐的把握能力。阅读作者对作品的析读文字，你会觉得师陀创作的“诗性”特质与作者的诗性感悟紧紧地融为一体。王欣的研究以文本解读为支撑，她总是遵从自己的审美感觉，融感性与理性于一体，并努力渗入自己的生命体验，实现与作家的精神撞击。她对研究对象的把握比较全面，面对研究对象的精神特点的理解又较为深入，力图凸显出历史现场中作家的创作轨迹与生命轨迹。从感性的审美体悟到知性的文本分析，再上升为理性的综合评价，师陀的成就及意义，在作者的细腻言说中得到清晰的呈现。这需要相当的功夫作细心的体察、分析和提炼。著作史料扎实、文风质朴、思路清晰、逻辑性强、语言流畅优美，有着冷静的学术理性，又不乏沉郁的情感流注。作者从事学术研究的较强能力和脚踏实地的良好学风，是值得肯定的。当然，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论师陀其人其作，应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当下意识，一种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发展意识。

师陀是20世纪乡土作家的杰出代表，也是诗化小说的积极探索者与实践者。他个性独具的文学世界不仅映照着过去，也昭示着未来。相信《师陀论》的出版，对于丰富现代作家研究，对于推动中国乡土文学和诗化小说的探索，都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赵学勇

2011年11月21日

# 目 录

引论 师陀研究的反思、重估及提升价值 .....	1
<b>第一章 特立独行气质生成的心理与文化含蕴.....</b>	<b>22</b>
第一节 旷野上生长的孤独心灵 .....	23
第二节 文化空间迁徙中创作个性的形成 .....	28
一、中原：创作的原乡 .....	28
二、北平：文化的启蒙 .....	32
三、上海：创作活力的激扬 .....	41
第三节 “个性主义”的启迪与主体意识的坚定 .....	48
一、“五四”新文化的滋养 .....	48
二、对鲁迅“个性主义”的承继 .....	51
<b>第二章 时代精神的个性言说.....</b>	<b>58</b>
第一节 文学主潮中创作主体的进退激荡 .....	58
一、三十年代 .....	58
二、四十年代 .....	63
三、新中国成立以后 .....	67
第二节 时代精神的呼应与表现 .....	74
第三节 对于“人”的全面谛视与深度关注 .....	92
一、“生活样式”的浮世绘与启蒙主题、文化思考 .....	93
二、探掘人性深度的自觉意识 .....	105
三、“生命”诗性的凝思与抒写 .....	114

<b>第三章 女性关怀及婚恋观</b>	<b>129</b>
第一节 女性生命关怀的独特性	129
一、从精神层面透视女性生命的真实处境	129
二、对女性现实关怀与超越性关怀的统一	142
三、在诗意图的抒情中发掘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	147
第二节 现代婚恋观	156
一、理想的家庭生活,是以男女互爱为基础的	156
二、稳固的经济基础才能强大婚姻自身	161
三、理想的女性,既有传统美德,又具备主体意识	165
<b>第四章 理想生态家园的文化想象与建构困惑</b>	<b>170</b>
第一节 作为“自然之子”的师陀	170
第二节 果园城——并非生态的乌托邦	174
第三节 《结婚》——都市生态恶化的寓言	179
第四节 乡土与都市双重批判中的建构困惑	185
<b>第五章 佛教浸润与超越情怀</b>	<b>199</b>
第一节 佛教文化的接纳	200
第二节 独立·担当·爱	207
第三节 对大生命的探究与想象	214
一、凝神“命运”	215
二、解读“死亡”	222
三、探究“意义”	228
<b>结语</b>	<b>236</b>
<b>参考文献</b>	<b>242</b>
<b>后记</b>	

# 引论 师陀研究的反思、重估及提升价值

---

师陀是一位以独特的创作风致、文化品格和艺术体验标举于现代文坛的作家。他的创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对其人其作的研究也同步而生，迄今为止，已经持续了近八十年。这八十年漫长而曲折，时而冷寂时而喧嚷的研究历程包蕴着丰厚的言说空间。它既理性地呈现出师陀的创作实绩、艺术成就，以及对其研究的发展脉络、思路方法变迁、现状与不足，为今后更深入的师陀研究作了充分而有益的铺垫；又折射出作家由被发现到被遮蔽，后又重新获得推崇与彰显的历史过程，从中透露出百年文学观念及现代性诉求衍变的讯息。

## （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感悟式品评中的独特身姿

师陀于1932年登上文坛，其最有价值的创作活动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期间他的创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越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而且体裁跨越小说、散文、戏剧、电影剧本、诗歌等诸多领域，这也构成了他文学成就的主体。然而，新中国成立前的师陀研究却主要集中于他的部分短篇小说集《里门拾记》、《谷》、《落日光》、《无名氏》、《果园城记》等和戏剧《大马戏团》、《夜店》的研究，没有立足于作家整个的作品世界，研究视阈相对狭窄、单一。

另外，新中国成立前师陀研究的方法也比较单一，主要是印象式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但因为批评家深厚的学养、敏锐的感受力和观

察力,以及敢于言说与担当的勇气,师陀研究中也闪现出璀璨的火花,频频出现中肯而具有开创性的评论。比如,1937年1月,师陀的短篇小说集《里门拾记》结集出版后,同年6月,京派的批评家刘西渭和左翼的批评家杨刚就相继发文评论。刘西渭以一个批评家的敏锐抓住了师陀创作中最为本真的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和创作追求。对于师陀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艺术个性,刘西渭有一个极为形象的概括:“诗是他的衣饰,讽刺是他的皮肉,而人类的同情者,这基本的基本,才是他的心。”<sup>①</sup>他还敏锐地感悟到了师陀与当时已经成名的沈从文相似的艺术质素和不同的创作追求:“沈从文先生和芦焚先生都从事于织绘。他们明了文章的效果,他们用心追求表现的美好。他们尤其晓得文章不是辞藻,而是生活。他们把文章塞得满满的,叫我们体会不是空买空卖,而是一桩下血本的生意……如若他们有一时会在一起碰头,碰头之后却会分手,各自南辕北辙,不相谋面的。”<sup>②</sup>杨刚则侧重从思想内容上来感受《里门拾记》中的篇章,预测这个“令人想到鲁迅”的文坛新秀会走向揭示国民精神痛苦的一途:“倘若中国的农村小说有它的前途,芦焚正在试着一条中国的有些迷惑性的路径。这条路可以向晦涩诡僻回去,也可以把这个懵懂的尚不曾十分明白自己的民族性揭发出来。”<sup>③</sup>其实,对于师陀创作中文体的模糊性、乡土气息的浓厚、风景描写的出色、情绪的动人、城乡的冲突、黑暗暴露的彻骨甚至作家老实、倔强、自卑的心理与文字的生涩、风景和人事的不谐,评论家们在文章中也都有非常出色的点拨。可这仅仅只是感悟式的轻轻一点,没有深化,更没有挖掘出其下所蕴涵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精神世界的来历去向。当时,杨刚、王任叔、金丁、孟实、刘西渭、唐迪、尹雪曼等不同文学流派甚至不同党派的评论家都参

①刘西渭:《读<里门拾记>》,1937年6月1日《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②刘西渭:《读<里门拾记>》,1937年6月1日《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③杨刚:《里门拾记》,1937年6月20日,上海《大公报·文艺副刊》,第351期。

与了对于师陀的评论。他们基于自身不同的文学与政治立场,围绕着师陀的作品展开了尖锐的交锋。比如左翼的王任叔与京派的刘西渭、沈从文围绕着师陀获得《大公报》文艺金奖的作品《谷》的论争,就是非常激烈的一场。王任叔在《评〈谷〉及其他》一文中,批评师陀疏于描写“真实的人物”“时代的影子”“理性的反抗”,断言“喂养着我们的作者的灵魂的血液”,是“几千年来在那封建君主作为工具的孔子教义的压迫下所反拨过来的老庄思想的传统”。他认为师陀:“沉溺于想象的巡礼,热爱着原始的反抗,有他纯朴可爱的心,却大意地抛撇了时代——时代如同一颗浑圆的珠,任意在手中玩耍,任意抛了出去——没有阶层的仇恨,只有冷眼不着边际的嗤笑。”他还一并批评某些“沉醉于诗样的温馨里的”评论家:“这一切,是我们的作家的过错呢?是我们不需要时代的批评家的过错呢?我们的批评家,是用了‘反差不多’的法棒,将我们的作家高擎到云端里了。”他甚至多次将师陀与沈从文并提,认为“是沈从文先生的手臂,长在作者的身上了”<sup>①</sup>。对于这些不乏武断与偏颇的评论,师陀与相关批评家们在不同场合都有或隐晦或尖锐的回应。其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各流派之间并不平静甚至有些剑拔弩张的关系,以及他们相去甚远的文学主张;我们还可以看到初登文坛的师陀表现出的与多个文学流派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的创作质素,以及各文学流派对于师陀才华的欣赏与看重,和接纳与重塑他的渴望。当然,师陀能在对自己既有召唤又有排拒的复杂的流派关系中保持自身的独立,实属不易。若没有与生俱来并日渐稳固的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和对创作立场的坚定把持,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

新中国成立前的师陀研究以跟踪式的文本研究为主,虽然评论家难以立足于师陀的整个艺术世界进行宏深的论述,但却能及时地指出作家创作的得失和可能遭遇的危机,对于作家创作水平的持续提高具

<sup>①</sup>王任叔:《评〈谷〉及其他》,1937年8月1日,《文学》,第九卷第二期。

有积极的指导作用。比如，1939年，师陀的《无名氏》结集出版。1941年，署名为杨洪的作者在《现代文艺》上发表了关于《无名氏》的评论。杨洪回顾了师陀的创作历程和目前遭遇的创作危机，指出师陀的创作源泉来自于“对农民的热爱”，“作者自己是生长于田园，来自田间的，对农民和土地的深厚的感情使得他成为一个出色的田园作家……愈是作者的初期作品，这种特点愈是明显。展开在读者眼前的，到处是生活，到处是形象，到处是香与色。一走入作者的世界，迎面扑来一股浓烈的泥土气味——作者的这一股泥土气味诱惑着读者，获得了成功”。可“就在抗战前一年中间，我们的可敬的作者的创作源泉显得贫乏枯竭起来了，泥土气息稀薄到等于零……如今是在回避着现实，走到一个空阔的寂寞的境地，离开了读者”“失掉他最迷人最可贵的那份宝藏——生活的宝藏了”。当抗战使作家重新回顾土地和农民，作家却因对它们的不再熟悉，变成了概念似的创作，作品也因此缺乏了感人的力量。因此，作者及时提醒作家，随着抗战现实的改变，作家的观察也应该随着改变：“这种改变应该是从生活体验中得来——也只有这样，作品才能得到它应有的生命。”<sup>①</sup>应该说，这种对于创作追踪式的评论，对一个勤于思考、善于自省的作家是极富警醒和借鉴意义的。果然，作家开始把视线转向了自己魂牵梦萦的乡土，转向了自己熟稔于心的情调与人物，终于于1946年完成并出版了“最得意”的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被誉为“文笔已进入圆熟凝练的境界”<sup>②</sup>。

总之，新中国成立前的师陀研究因为视阈的狭窄、方法和立场的单一，影响了其广度和深度，与现实的太过贴近也使它容易陷入人事的缠绕而略失公正，而靠时空的距离才能形成的那份宏深、系统、超越更是

<sup>①</sup> 杨洪：《无名氏》，1941年1月25日《现代文艺》第二卷第四期。

<sup>②</sup> 尹雪曼：《师陀与他的〈果园城记〉》，《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50页。

难以谈起。但另一方面,它也因与作家创作趋于同步而少了无妄和扭曲的假设,更见生活的气息与实感。更为重要的是,尽管许多批评家的评论还处于一种朦胧的即兴状态,但在他们散金碎玉般的感悟与品评中,却已经凸显了师陀在文坛上的独特身姿。他们作出的那些中肯而具有开创性的评论,虽然只是蜻蜓点水,感性提及,但却给后来的论述留下了广阔的言说空间。事实证明,后来的研究许多就是循着他们最初的感触向着纵深拓展。

### (二)20世纪50—90年代:从单一判断走向多维视野

新中国成立后到新世纪以前的师陀研究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前的冷寂,八十年代的复苏和九十年代的生长过程。这一时期的师陀研究主要体现在文学史的叙述和学术论文的写作之中。

1954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在政治与审美话语的交织变奏中,王瑶用了近2000字的篇幅对师陀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作了评价。他利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既遵循主流话语关于历史叙述的原则,认为作家“看不见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消沉感伤的情绪流贯其间”,又不由自主地听从审美感受的召唤,为作家“人物心情的描写和文章风格的完成”,为“写得优美完整的《果园城记》”而赞许。其中极具概括性的一句评价“虽然在写作技巧上还相当圆熟,但积极意义就很少了”<sup>①</sup>,充分体现出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文学史家在政治与审美之间踌躇,但政治话语最终还是压倒审美诉求的事实。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唐弢只用了300多字的篇幅介绍师陀。他措辞颇为谨慎,论述也显得保守,主要从思想意识和艺术刻画两个方面,简单提及了作家反映河南苦难生活的小说集《里门拾记》:“他的《里门拾记》反映了故乡河南的生活:‘绅士和老爷’的横行,‘老实的庄稼汉

<sup>①</sup>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336页。

子’的受难，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作者善于描摹世态，刻画风习，时而复带着揶揄的口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他认为师陀与三十年代中期北平、天津的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一样，“对于作品的艺术形式的探索怀着浓厚的兴趣，相比之下，对于政治和社会现实，最初就不是那么重视了”。<sup>①</sup>在评价标准和研究视阈上，唐弢基本上还是延续了王瑶对于师陀的文学史叙述。只是他第一次把师陀与京派的作家联系在一起。当然，唐弢对此次“集体讨论、集体执笔”的文学史写作是无不遗憾的。五年以后，他在给师陀的通信中袒露心迹：“大架子早已由王瑶、刘绶松他们搭好了。又因是教材，论点尚未是大家公认的，即使新颖，也不写入，这样就一切服从‘定论’，不能写个人研究成果。”他向老朋友道出了心愿：“倘有时间，写完鲁迅传记后，想自己负责写一部。一家之言是非由我个人承担。”<sup>②</sup>只可惜，唐弢几年后故去，历史在这里留下了遗憾。然而，同样是在1979年出版，由海外华人夏志清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中，师陀却从文学史的边缘位置进入了中心的书写，作为专章长篇论述。夏志清个人著述的文学史或许带着更多的主观色彩，在叙述的开头，他就毫不晦饰对师陀才华的个人判断：“论才情，师陀是比不上钱钟书和张爱玲的。”<sup>③</sup>虽然师陀以短篇小说集《谷》获得了《大公报》文艺金奖，但与以往文学史家看重师陀的乡土小说不同，夏志清以迥异于流俗时见的敏锐眼光指出：“他真正值得我们珍视的小说作品，该是1947年出版的长篇《结婚》。”<sup>④</sup>夏志清遵循文学价值的评判准则，忠实于自身的审美感受，使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师陀整体的创作

①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二）》（节录），《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310页。

② 刘增杰：《心灵之约——友人书简中的师陀》，《师陀全集8》，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586页。

③ 夏至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节录），《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310页。

④ 夏至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节录），《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311页。

情况进行概述以后，着重对短篇小说《父与子》、《果园城记》，长篇小说《马兰》，特别是对长篇小说《结婚》进行了重点评述。他在《父与子》中“父子对立”这个永恒主题、《马兰》中技巧和情节方面的独特心得以及《结婚》的叙述技巧、典型形象塑造、人性透视、寓言性主题等方面揭示和论述都具有开创的意义。他高度地称赞《结婚》，认为“若纯就它的叙述技巧与紧张刺激而论，《结婚》的成就是在现代中国小说中实在是罕有其匹的”<sup>①</sup>。几年后，夏志清在上海与师陀见面，临走时一再嘱咐师陀“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千万别学别人，他们那是一时的，你这是永远的”<sup>②</sup>。1988年师陀逝世以后，夏志清给师陀夫人写了长信，表达对师陀的怀念之情，他说：“1983年我在国内见到的老作家，张天翼先过去，沈从文今年5月走了，现在轮到了师陀。沈老特别红。张天翼海外也没有人撰文纪念他，但他同师陀却已是不朽的作家，这是可以告慰的。”<sup>③</sup>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的出版，开拓了师陀研究的视阈，提高了师陀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唤起了批评界对这位即将被遗忘的作家的重新关注。而夏志清对于作品评判的文学性标准，对于边缘作家重新发掘的胆识与慧眼，观照作品的审美性视角和人性关怀对后来的文学史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86年出版的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杨义将师陀与徐訏、张爱玲、钱钟书并置于一章，各分专节论述。杨义不以流派对师陀进行归队，而是就作家在北平与上海两个不同的文化时空中创作内容、创作风格、创作追求的动态变化进行评述，评价视角和方法也较为灵活多样。最后，杨义对师陀“作为多姿多

① 夏至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节录），《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314页。

② 王鹏飞：《记忆中的身影——与陈婉芬女士谈师陀》，《师陀全集》8，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9页。

③ 刘增杰：《心灵之约——友人书简中的师陀》，《师陀全集》8，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1页。

彩的小说体式的探索者形象”作出了定位。<sup>①</sup>由钱理群主编的1987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师陀还只是在200字的篇幅中被简单地提及,他被纳入了“京派小说”这一节,认为是一个前期具有京派风格,而“40年代趋向‘左倾’”<sup>②</sup>的作家。简短的篇幅中作者只用概述性的语言勾勒了他的《谷》、《里门拾记》的乡土气息、契诃夫风格,和以后的传奇性的寓意的讽刺笔调。而在钱理群主编的1998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关于师陀的论述就得到了明显的深化和扩展。作者用了近千字的篇幅来评述师陀。他将师陀与沈从文、废名进行比较,阐述师陀作品中的“中原文化意象”“精神还乡结构”“文体的模糊性特征”等深层意蕴。虽然依然从师陀的作品研读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的创作基本倾向属于京派”,他的小说同散文“可自然汇入京派的乡土抒情体而毫无愧色。”<sup>③</sup>可在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作者强调说:“芦焚在京派中是有它的艺术个性的。”接下来,专门用一个自然段,从“芦焚农村人物贫富的清晰度很明显”、“他的讽刺的加重”和“小说的叙述更讲究”<sup>④</sup>三个方面对师陀不同于京派其他作家的思想、艺术特征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论述。虽然作者的关注点依然侧重于作家创作的乡土文学,但师陀在文学史,特别是在京派小说史中的个性,是明显突出了。在文学史的叙事中,我们看到了师陀逐渐去蔽并且个性和地位日益凸显的过程,以及对其研究不断拓展、丰厚的过程。虽然在关于师陀早期的文学史叙事中,存在着政治意识形态侵扰和文学史家对某些史实把握有误的问题。但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随着时代的前行,文学史对于师陀的评述立场更加接近文学的本性,依据更加靠近历史的真实,

①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25页。

②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页。

③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④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

视阈更加开阔,方法更加多样,深度更加拓展,已经从对表层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的概括上升到了对深层的精神气质、文化意蕴、审美特质、文学史中的个性与定位的研究与探索。当然,文学史的学科性质毕竟使它不能对历史上的某个作家作出详尽的阐述,但它提纲挈领的叙述和态度却可以推动学术界对作家研究的热情与深度。学术论文中师陀研究的长足发展就是与文学史的叙述相辅相成、互相呼应的。

新中国成立后,师陀研究一度非常冷寂。少量关于师陀小说、散文的评论性文字,仍然属于感悟性品评,未能达到学术论文的高度。真正称得上是新时期师陀研究的奠基之作的是刘增杰于1982年发表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的学术论文《师陀小说漫评》<sup>①</sup>。该文对师陀生平、小说创作、文界对其人其作的评论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拉开了当代学界对师陀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的序幕。接下来发表的刘纳《师陀创作的艺术个性》<sup>②</sup>和邹午蓉的《论师陀小说的思想和艺术》<sup>③</sup>等文章,运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力图对师陀创作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作出全面把握。他们立足于丰富的文本、史料扎实、论证周到细密,对师陀独特的题材领域、描写内容、观察角度、艺术情趣以及淳朴蕴藉的艺术风格等都有客观清晰的阐述,但由于作者对政治话语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路的创新与拓展,论述也有过于求全之嫌。不同于八十年代研究以面为主,九十年代的师陀研究形成了点面结合的立体格局。不少论者随着文学观念的深化和理论方法的更新,不再满足于一般意义上的反映论和意识形态原理,在研究思路、视角、方法上都有了拓新,师陀研究进入了一个积极的生长期,涌现出了一批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以对师陀创作的全面研究而论,杨义的《师陀:徘徊于乡土抒情和都市

<sup>①</sup>刘增杰:《师陀小说漫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sup>②</sup>刘纳:《师陀创作的艺术个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期。

<sup>③</sup>邹午蓉:《论师陀小说的思想和艺术》,《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